

隋唐时期儒释道文化 与政治思想研究

乔凤岐 乔泽胤 ◎ 著



人民出版社



隋唐时期儒释道文化 与政治思想研究

乔凤岐 乔泽胤◎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唐时期儒释道文化与政治思想研究 / 乔凤岐, 乔泽胤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01 - 019108 - 9

I. ①隋… II. ①乔… ②乔… III. ①佛教史—思想史—关系—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②道教—思想史—关系—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③儒学—思想史—关系—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B949. 2 ②B959. 2 ③B222. 05 ④D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4980 号

隋唐时期儒释道文化与政治思想研究

SUITANG SHIQI RUSHIDAO WENHUA YU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乔凤岐 乔泽胤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108 - 9 定价: 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成果

前 言

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无论是中国原有思想文化，还是从国外传入的各种宗教观念，均有其存在和发展空间。总的来说，隋唐帝王是推崇儒学、重视儒术的。王通“三教可一”与“中道”思想，既坚持周孔之道，又把佛、道的有关思想引入儒学之中。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与国家政体论，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为核心，全面论证了仁义、礼法、刑罚的政治功能。韩愈的道统论与尊君思想，推崇儒学，但并不独尊一家，主张以儒学为主、兼容百家之学，提出了系统的道统论，开理学之先河。

隋唐时期，佛教逐渐从印度佛教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教义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禅宗的传播侧重于社会的中下层，其教义简易，采用当时流行的曲调，通俗易懂。这一宗派的兴起及其在后来的发展，和唐代庶族地主当权者势力的上升是有一定关系的。

道教与王权彼此视同一家，老子崇拜成为道教思想发展的主流。道教则应合王权的需要，调整教义，伦理化色彩日益浓重，成为向信徒灌输纲常、孝悌的重要途径之一，成为统治者用来美化王权、教化民众的工具之一。道教各种仪式的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艺术化，使修道者有法可依，促进了道教自身的发展。

唐代中叶，庶族地主阶级政治集团力量上升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剧烈斗争，和社会批判思想的发展，汇聚成一股社会政治批判思潮，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君主和纲常礼教，对封建等级制度及圣人、帝王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的意愿，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隋唐君道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实践性和典范性。君臣论政大多广征博引，不拘一家一派，以孔、老思想为主，兼蓄佛、道理论，融合诸子百家，自成体系。大凡政治取向、治国方略、决策方式、策略原则和施政技巧，几乎无所不包；政治体制、政策方略和统治权术，成龙配套。君臣们围绕君与天、君与民、君与臣、君与法、君与谏、君与德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以君主自我调节理论为重点的思想体系，把君主控制社会的刚性手段同调节政治的柔性手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隋唐的学术思想批评多与佛学有关，当时的文人学士与佛学界都有广泛的交友。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性”、“情”问题，或者参取佛学、道学，或者依傍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展开了广泛的学术批评。当时的理论动向是儒、佛的合流，各派代表人物都有意做这样的尝试。学术批评与儒、佛、道合流的动向，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政策	004
第一节 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	006
一、隋文帝时期思想文化政策的变化	006
二、隋炀帝时期思想文化政策的转变	011
三、隋朝的佛教、道教政策	013
第二节 唐朝思想文化政策的演变	015
一、唐朝的儒学政策	015
二、唐朝佛教政策的演变	018
三、唐朝的道教政策	023
四、唐朝对佛道的管理	026
第二章 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政治思想	028
第一节 王通的“三教可一”与“中道”思想	031
一、儒学是王通的思想基础	031
二、“三教可一”论	032
三、以“礼”为中心的“中道”观	035
四、兴王道,正礼乐	036
第二节 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	038
一、自然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论	039
二、儒家“礼”、“仁”内涵的提升	042

三、系统的君德论	045
第三节 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及国家政体论	047
一、国家政体论	047
二、大中之道	050
三、经权统一论	053
四、吏为民役	053
第四节 韩愈的道统论与尊君思想	054
一、道统论	055
二、性品说	057
三、君主制度的合理性	059
 第三章 隋唐之际的佛学	061
第一节 佛学的社会基础与政治观念	061
一、佛教哲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062
二、佛教教义的驯服臣民作用	063
第二节 隋唐之际的佛学宗派	065
一、吉藏与三论宗	065
二、智顗与天台宗	070
三、玄奘与唯识宗	077
四、佛经的大量翻译	086
 第四章 武周时期新兴的佛学宗派	088
第一节 法藏与华严宗	089
一、法藏的思想特点	090
二、法藏的判教论	091
三、法界缘起论	094
四、华严宗的义与理	098
第二节 禅宗的佛学	100
一、禅宗的兴起及初期演变	100

二、慧能的生平与思想特征	103
三、禅宗的修行理论	108
四、禅宗的心性论	112
第五章 道教的主要流派及其学术特色	115
第一节 谶纬流行与道教勃兴	115
一、道教谶纬的流行与统治者的崇信扶持	116
二、道教经典注疏的繁盛	118
第二节 成玄英与“重玄”论	119
一、成玄英的“重玄”思维	120
二、仙道修行理论	127
三、“圣王治世”论	131
第三节 王玄览的“道体”论	136
一、“常道”与“可道”	137
二、“寂”与“动”	137
三、“有”与“无”	138
四、“空”与“道”	139
五、修道论	140
第四节 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	143
一、坐忘收心	144
二、五道渐门	148
三、“无欲”与“静心”	149
第五节 吴筠的修道论与政治论	150
一、天人合一论	151
二、吴筠的修道论	152
三、道德、天地、帝王三位一体论	155
第六节 李筌的阴符说与政治观	157
一、李筌的阴符论	157
二、至道与修身	159

三、名法治国论	161
第七节 杜光庭的道教理论	164
一、道教理论的宗教化和社会化	164
二、道法三乘	169
三、成仙途径的多样性	174
四、纳儒于道	179
第八节 道教戒戒对大众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	180
第六章 学术思想批评与政治思想批判	184
第一节 吕才对术数迷信的批判	186
一、吕才对术数迷信的批判	187
二、吕才对因明学说的批判	189
第二节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及其思想特点	191
一、刘知幾的史学批评	191
二、刘知幾对神学的批判	199
三、刘知幾的进步历史观	202
第三节 “天人之际”的论辩	207
一、韩愈的天命论	209
二、柳宗元的天与人不相干预论	210
三、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学说	213
第四节 反佛、道的斗争	219
一、傅奕及其反佛论	219
二、唐朝中期的反佛、道言论	222
三、韩愈的反佛论	227
四、反佛、道斗争的复杂性	229
第五节 牛僧孺对阴鹭果报思想的批判	230
一、李德裕的阴鹭果报说	231
二、牛僧孺对阴鹭果报说的批判	234
三、牛僧孺的政治历史观	236

第六节 隋唐、五代政治思想批判	238
一、《无能子》对封建等级制度及圣人、帝王的否定	238
二、对暴君的批判	243
三、对贪官、暴政的批判	247
第七章 隋唐时期统治思想的发展	250
第一节 制定巩固统一措施是隋朝统治思想的核心	250
一、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	251
二、改革选官途径、扩大统治基础	255
三、修订刑律、依法治国	258
四、推行闾里制度，加强户口控制	261
第二节 隋唐皇朝发展社会经济的观念创新	263
一、民本治国思想	264
二、均田制下的重农政策	268
第三节 隋唐皇帝的为君之道	270
一、君民一体论	271
二、驭群臣与驭天下	276
三、家天下与公天下	280
四、人治与法治	285
五、兼听与独断	288
六、以孝治天下	292
七、隋唐君道思想的特点	295
结 论	297
参考文献	299

绪 论

隋唐两朝，中国古代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封建统治思想也趋于成熟。隋唐的一些皇帝励精图治，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在统治思想方面也多有著述，阐述他们的安邦治国理论。例如，隋文帝杨坚著有《刑书要制》，并主持修订刑律，倡导依法治国。唐太宗李世民思想上兼综孔、老，撰有《帝范》及《金镜》、《民可畏论》等论著，强调为政之道要重视民生。唐玄宗李隆基注疏了《孝经》、《道德经》等儒家或道家经典，在主张以孝治天下的同时，也将道家思想运用于其政治实践。隋唐时期的君道理论是以帝王为核心的君臣群体所共同创造的，每一位帝王身边都聚集着一批辅弼公卿和诤谏之臣，代表人物有隋文帝时的高颎、苏威，唐太宗时的房玄龄、魏徵，武则天时的刘仁轨、狄仁杰，唐玄宗时的姚崇、宋璟等。群臣的政见或政策建议多被帝王采纳，转化为帝王的治国方略。隋唐时期的历届政府大都对各家学说采取容忍态度，因而以儒、佛、道为主的各种思想均有较大发展，隋唐思想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群体、这股思潮所共同拥有的政治思维成果。

对于隋唐时期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几本《中国思想史》之中，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下册）等。由于思想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几部中国哲学史专著中也涉及唐代的思想史内容，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詹石窗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等。中国的古代政治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的，隋唐时期的儒家思想也就有着较大的发展，并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刘泽华、葛荃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有两个章节是讨论隋唐皇

帝的君道观和儒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

对于隋唐时期的各种思想，也有相当数量的专题研究，分别研究儒学、佛学、道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其成果主要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儒学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如：陈磊《论南北朝至唐初的儒学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史林》2005年第6期）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方儒学教育的传播以私学传承为主，南方则主要通过家学和国子学，而隋及唐初的儒学传承在保有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趋于接近，进入经学统一时代；刘光育《隋唐儒学发展及其特点》（《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提出，隋唐儒学上承两汉，下启宋明，注重心性义理和世俗化、平民化的精神气质是宋学不同于汉学的重要特征，这一学术上的转向是在隋唐儒学不断演变积累中逐渐形成的。

佛学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其社会功能，如：薛志清《禅宗的“顿悟成佛”对唐宋之际寺僧经商的影响》（《河北北方学报》2005年第2期），专门探讨了禅宗的“顿悟成佛”主张的形成和广泛传播；马冰洁、商卫星《佛教的顿悟心理思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着重分析了禅宗中顿悟思想的由来、顿悟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现机制；邹元丰《佛教的平等思想及其现时作用》（《大众科技》2008年第7期），论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的内涵具体包括人与人之间平等、众生平等、众生与佛的平等、众生与无情的平等四个层次，提出其对于提升个人的素养、维持世界和平、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对于道教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道教与文人的关系及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如：赵超《初唐的崇道狂迷——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论述了初盛唐诗人的崇道风貌及其文化成因；尚丽新《道教音乐与唐五代词》（《晋阳学刊》2000年第4期），论述道教音乐与宫廷、民间音乐交流后纳入词乐并由此产生艳情化倾向，从而为唐五代词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刘敏《试论道教对唐传奇兴起的影响》（《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唐传奇弥漫着浓厚的道教氛围，蕴涵着深沉的道教文化内涵。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基本原则。隋唐时期推行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与隋唐时期思想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铺垫了道路、有较为广泛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进一步研究隋唐时期的各种思想问题，对于正确认识隋唐时期的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章 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政策

隋唐两朝是继秦汉之后的中国又一个大统时期，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这两个时期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消除分裂割据、建立一统局面的秦、隋两朝都是短命的皇朝，从建立至灭亡仅有二世，但三十余年的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却有着巨大的发展；继之而起的汉、唐两朝虽然其间有大起大落，但也均有数百年的长期稳定发展，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思想文化不是凭空而来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无论是中国原有思想文化，还是从国外传入的各种宗教观念，均有其存在和发展空间。在这一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思想界基本上处于三教并立，儒学、佛教、道教“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为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不断发生冲突与碰撞，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从春秋时期的老子和孔子开始，儒家、道家之间的争衡持续了数百年，孰是孰非、孰本孰末并无定论。但是到了汉代，依托道家思想而创制的道教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才逐渐有儒教、道教称谓。随着佛教传入并逐渐兴盛，思想领域内的斗争由儒、道两方变为儒、道、佛三方。东汉襄楷云：“或言老子入夷狄为佛屠。”^① 这条记载说明，佛学传入中国之初，就有把佛教说成是老子所创而有意贬低佛教的说法。三国时期，牟子在《理惑论》中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故法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2页。

之焉。”^① 随着佛教影响的逐渐扩大，牟子又反过来把老子说成是佛教的门徒。魏晋以来的思想家很明显地划分为崇佛、崇儒、崇道三大阵营，面对佛教势力的崛起，道、儒常常结为统一战线，依据华夷之辨、伦理纲常、王权至上，共同排斥外来的佛教。三教之争并非仅仅表现在思想领域，不仅涉及政治理论、统治思想地位，还涉及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甚至直接引发政治斗争。“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就是政治斗争的典型例子。

与政治思想直接相关的是佛教徒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佛教徒是否属于中国皇帝统治下的臣民、是否应当礼敬君父，佛教在中国流行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这种争论有时非常激烈。儒教、道教的思想观念在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君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而佛教的原始教义与中华的纲常名教多有相悖之处，这是佛教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原因，三教之争也常常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自晋朝慧远法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以维护佛教教义以后，朝堂之上经常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有关这方面的辩论充斥于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文献中。除梁武帝等少数佞佛帝王准许僧人不敬君父外，绝大多数皇帝则不能容忍这种违背中国传统礼法的做法。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多次受到官方打击之后，佛教教义在某些方面终于向中华传统礼法屈服，三教之争趋于缓和。“从佛教到儒教，看似不同教义教理的变换，事实上这两家是接着讲的，讨论的问题是衔接的，思想发展的深度是逐步加深的。形式上、文字上有攻击，实质上是一贯的。因为儒教和佛教都是中国哲学，有继承关系，有内在联系。”^② 在相互排斥、相互渗透过程中，三教学说都有突破性发展，思想理论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吸收消化过程，“经过自唐迄宋的消化吸收，遂有儒家理学与心学别开生面的崭新发展。由此，不仅儒家自身彻上彻下的形上哲学义理世界得以建立，儒、道、释三家和合互动的学术生态格局亦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力求妥善安顿人之精

① （南朝梁）释僧祐：《弘明集》卷1《理惑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71页。

② 任继愈：《从佛学到儒学——唐宋思潮的变迁》，载《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3页。

神生命的特征与能力进一步强化。两宋大儒多与宗门禅德相往返，禅学实际上成为他们体道、证道的入门初阶，这既是当时“三教合一”历史潮流的具体表现，亦反映了华夏传统学术作为人类体认宇宙人生真谛之智慧成就在心灵安顿乃至宗教层面的文化调适功能。”^① 佛、道二教对汉唐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影响，其深远程度不在儒家之下。宋朝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柔和了佛教、道教思想的“理学”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

第一节 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

隋朝虽然仅有三十七年的历史，但文帝、炀帝父子二人的治国思想却不相同，即使文帝、炀帝各自执政期间的思想文化政策，前后也不一样。

一、隋文帝时期思想文化政策的变化

隋文帝执政二十余年，其思想文化政策前后变化较大，对于儒、佛、道的发展影响也相当明显。

（一）开皇初期的重儒政策

隋朝初年，思想文化政策的重要一项就是“诏天下劝学行礼”。^② 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学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下降，“劝学行礼”实质上就是复兴儒家学说和礼仪之道。儒家思想观念虽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随着隋朝政局的变化，隋朝对待儒家思想文化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隋文帝代周的最初几年，内有来自周朝皇室和封疆大吏的反对，外有以突厥民族为主的外部势力的武装干涉，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成为隋朝维护政权的首要任务和主要手段。军事斗争虽是夺取政权的重要手段，治理

^① 张新民：《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文史哲》2016年第6期。

^② （唐）魏徵等：《隋书》卷1《高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9页。